

赁常彬 著

鲁迅治学浅探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鲁迅治学浅探

赁 常 彬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张晓谷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鲁迅治学浅探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5.125 插页1 字数101千

1981年8月第一版

198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60册

书号：11118·73

定价：0.46元

目 次

鲁迅治学浅探	(1)
鲁迅论写实	(43)
曲笔杂札	(72)
鲁迅新体诗歌漫谈	(111)
“遵命文学”散论	(131)
鲁迅与科学	(150)

鲁迅治学浅探

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郭预衡同志的《关于鲁迅治学方法的探讨》，主要探讨鲁迅治学的基础功夫“在于治史”，并由此而论述鲁迅在辑佚、校勘、目录、版本、考证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。郭文已经讲了的，就不重复了，准备仅就鲁迅治学的精神、经验和方法等，做一些粗浅的论述，希望对当前有志于从事科研的同志们能够起一点参考作用。

一 治学精神

鲁迅的治学精神大致概括为：勇于创新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学习他的这种治学精神：

反对因循守旧 开辟各种新方面

我国悠久的历史留下大量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，同时也有不少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，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弊病

就是：因循守旧，反对革新。

鲁迅在一封信里，生动地讲到这个弊病的情况：老先生不但肯在黑屋子开一个窗，而且提出种种不可开的理由，一旦有人来把屋顶掀掉，他这才惊慌失措，经过一番调解折中，虽然答应开一个窗，却总在想方设计，要把它封闭起来。（《鲁迅书信集》下卷第795页）这些所谓读书人，对于后起者或禁锢，或挡驾，而他们自己终于老死在原封不动的地方。鲁迅自己就深有所体会，曾向某些“导师”们请求指点前途方向。他们只说，不可向那方走，就是不说应该向那方走。鲁迅“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：不过是一个‘不走’而已”（《华盖集·这个与那个》）。他们竭力反对革新，“满车的‘祖传’，‘老例’，‘国粹’等等，都想来堆在道路上，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”（《华盖集·通讯》）。

但是，守旧必然停滞不前，革新终当夺取胜利。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证明了的：“生物学家告诉我们：‘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，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。’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，猴子终于是猴子呢？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——它爱用四只脚走路。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，试用两脚走路的罢，但许多猴子就说：‘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，不许你站！’咬死了。它们不肯站起来，并且不肯讲话，因为它守旧。人类就不然，他终于站起，讲话，结果是他胜利了。现在也还没有完”（《而已集·革命时代的文学》）。因此，“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，无法遏止”，“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，一定有迁移；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，一定有改

变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从“别字”说开去》)鲁迅后期充满信心地作了一个为以后所证实的科学预言:“历史的巨轮,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;我已经确切的相信:将来的光明,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,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”(《集外集拾遗·〈引玉集〉后记》)。

所以,鲁迅告诫人们,不敢创新,畏首畏尾,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成就:“要进步或不退步,总需时时自出新裁,至少也必取材异域,倘若各种顾忌,各种小心,各种唠叨,这么做即违了祖宗,那么做又象了夷狄,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,发料尚且来不及,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”(《坟·看镜有感》)。

学术研究决不能因循守旧、原地踏步,必须勇于开拓,敢于开辟各种新方面。

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王元初露头角以后,他还不知道怎样去开拓,于是他在同类的问题上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。这件事被华罗庚发现了。

“这是在原地踏步。这怎么行呢?”华老焦急着,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,然后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有了速度,很好嘛,还要有加速度啊!”

多年来,王元一直觉得华老的批评是对的。王元说,物体运动要有加速度,需要外力;科学研究要有加速度需要勇于开拓。他把“有速度,还要加速度”,当作自己的座右铭。

科学研究要象地质工作那样去勘探。

地质工作的探索性很强。地质勘探的每项任务都是探索

新的情况，工作的对象都是有待研究的未知数。当一个地区、一个对象探索清楚了的时候，另一个新的地区、新的工作对象又在等待它去进行新的探索。要勇攀高峰，不断地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。

敢于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

在《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》一文中，鲁迅揭出一种毫无主见的通病来：“中国的作文和做人，都要古已有之，但不可直钞整篇，而须东拉西扯，补缀得看不出缝，这才算是上上大吉。所以做了一大通，还是等于没有做，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。”

在《作文秘诀》一文中，他又讲过类似的话：“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，是要通篇都有来历，而非古人的成文；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，而又全非自己所做，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；也就是‘事出有因’，而又‘查无实据’。到这样，便‘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’了。简而言之，实不过要做得‘今天天气，哈哈哈……’而已。”

这种毫无主见的通病，是鲁迅根据大量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。汉朝以后，“业儒”把言论的机关垄断了，几乎看不见一部非“业儒”的书，听不到一切非士人的话。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，其余异端的声音，决不能出他的卧室一步。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，讲理学，尊孔子，千篇一律。象王安石这样的一些人，虽然有所革新，行过新法，但遭到许多人的反对，终归失败。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，走老路，一直到

宋朝的灭亡。《《集外集拾遗·老调子已经唱完》》明朝有个张岱，甚至说他自己“心如止水秦铜，并不自立意见”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九》）。清初学者，纵论唐宋，搜讨前明遗闻；而文字狱后，便专事研究错字，争论生日，变成“邻猫生子”的学者，辛亥革命以后，仍然墨守着奴才家法。（《鲁迅书信集》上卷第521页）

总之，历史上这些所谓“学者”，都没有自己的头脑，惯于唱老调，走老路，千篇一律，人云亦云，鹦鹉学舌。这样僵化的意识形态，正是长期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的产物。

对于历史上陈陈相因的说法，鲁迅从未随声附和，力求发前人所未发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例如，年轻时写的一首七律诗《莲蓬人》就很值得注意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，人称濂溪先生。他做了一篇散文《爱莲说》，赞美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“亭亭净植”。周敦颐吹嘘“爱莲”，目的在显示自己的高洁的品格。在封建社会中，这个说法长期为人附和称颂。但是，青年鲁迅在1900年秋写的这首诗，却一反旧说，说出前人未曾说过的话来：

芰裳荇带处仙乡，风定犹闻碧玉香。
鹭影不来秋瑟瑟，苇花伴宿露瀼瀼。
扫除赋粉呈风骨，褪却红衣学淡妆。
好向濂溪称净植，莫随残叶堕寒塘！

荷花谢后结的果实就是莲蓬，状如碗，内生有莲子可作

食品。清诗人吴伟业有《莲蓬人》诗，大概以莲蓬拟人。鲁迅的这首诗，前六句集中描绘莲蓬处在寂寥冷落的环境中，仍然保持着优秀的风貌和朴素清雅的风骨。末二句是诗的主旨：称得上“亭亭净植”，不是周敦颐所喜爱的莲花，而是亭亭玉立在残荷堕入的泥塘之中的莲蓬。这首诗展示了青年诗人的高洁理想，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富于哲理的新思想。

青年鲁迅能够有这样的新见解，当然不是偶然的，他少年时曾广泛地涉猎了一些不同于正统观念的野史和笔记；而写这首诗的前两年，鲁迅以浓厚的兴趣读了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（严复译），发现了“物竞天择”的新境界。

当然，这是写诗，不是学术研究；而笔者之所以要把它拿来举例，主要说明鲁迅在年轻时所具有的这种创新精神，在他一生治学中都是充分体现了的。或是历来人们很少碰的难题，或是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问题，或是被认为可以轻易对付的课题，他都做了创造性的努力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。总之，他要有自己的见解，即使是很有名望的学者的意见，从不盲从，也不把它作为定论。例如他在《〈出关〉的“关”》一文中所讲的那样：为了孔子的几句话，老子西出函谷。这个意见是鲁迅在东京从章太炎口头听来的，以后写入他的《诸子学略说》中。但鲁迅“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”。正如许寿裳所说：“他的观察史实，总是比别人深一层，能发别人所未发，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。我们试读《而已集》里那篇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便可窥见一斑。是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的一段，思想很新颖，议论很透辟，将一千六百年

前人物的真相发露出来，成了完全和旧说不同的样子”（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）。

“如果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，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”（《两地书·六六》）。

鲁迅的这句话，使我们记起恩格斯在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中评价马克思时所说的一段话：一个人“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，该是很够了。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，也已经是幸福的了。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（甚至在数学领域）都有独到的发现，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，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。”

跨过那站着的前人

1949年7月26日，北京饭店举行晚会。冯亦代同志请周总理在他的纪念册上签名。当总理写到“一代”时，冯说“亦代”。

总理抬起头来，用深邃的眼光扫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我是有意给你改的，为什么要‘又一代’呢？应当做个开创一代的人。我们无产阶级要建设新世界，每个人要有做一代豪杰的雄心壮志。我建议你把名字改了，不过要做到名副其实！”

周总理的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签名，对于我们治学有很大的启示：开创一代和名符其实，是科研工作者的特有的风格和抱负，既要敢于打破传统的束缚，努力创新，勇攀高峰，赶超前人，而不是维持现状，到此观止；又要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，实事求是，精心探索真理的严肃的科学态

度。这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：“判断历史的功绩，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，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。”

这种开创一代的革命精神，在鲁迅的治学方面也有所体现。一方面对于前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，仍然向大家推荐。1930年在他编辑的《文艺研究》季刊上，他写了一篇《例言》，其中特别指出：“凡前人旧作，倘于文艺史上有重大关系，划一时代者，仍在介绍之列”（《集外集拾遗附录二·〈文艺研究〉例言》）。

另一方面，他又鼓励青年努力赶超前人：“……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，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，以诚恳的心，进一个苦口的忠告。那就是：不断的(!)努力一些，切勿想以一年半载，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，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。还有一点，是：不要只用于抹煞别个，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，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，比前人更加高大。初初出阵的时候，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，然而也须不断的(!)生长起来才好”（《三闲集·鲁迅译著书目》）。而鲁迅自己在1930年修订他七年前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时，却谦逊地说它“别无新意”，热忱希望超过他的“杰构”问世。（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·题记》）

这是鲁迅激励青年的经验之谈。怎样才能赶超前人？这里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：不要以为发表了几篇文章，就以为大功告成，可以搁笔了，起点就是终点。这是一。自己有了科研成果，不能否认与别人相关的研究劳绩；即使别人

有错误之处，也不能一概抹煞。任何人取得的科研成果，莫不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直接或间接有关。获取一项研究的成果，许多人失败了，最后一人成功。这样的例子不少。这是二。对于青年初次发表的文章，不必斤斤计较其浅薄和幼稚，鲁迅历来就有这样的看法。他虽然惭愧自己的“少年之作”，“却并不后悔，甚而至于还有些爱”（《集外集·序言》）。高楼起于脚下，大树成于萌芽。这是三。总的说来，治学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：不断的努力！这也就是鲁迅一贯主张和坚持的韧战。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很艰苦的工作，必须有锲而不舍、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。赶超前人、有所突破没有什么捷径可寻的。

著名生物学家童弟周说过这样十分动人的话：“我 现在只是在生物遗传的基础理论研究上，为同代和后代人做一点铺路的工作，就象一捧沙土、一粒石子，让别的科学家踩在我的身上继续往前走。就是失败了，让别人能吸取我的教训，绕开这条道，也有好处。”

二 治学经验

鲁迅有自己的和继承前人的治学经验：

从书目入手

鲁迅治学，重视书目。在他的藏书里，有许多出版年代不同和地域不同的书目。

许广平说：“鲁迅先生研究学问的方面很广博，大致对于前辈的从书目入手的方法也并皆采纳，在他消闲的时间，就时常看见他把书目看得津津有味。”有时鲁迅也解释给许广平听：“这是治学之道，有人偷偷捧住《书目答问》死啃一下就向人夸耀博学的了，其实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从书目入手，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一个治学的好经验。

首先，书目提供必读的基本书。研究某项学科，一开始就要学习某项学科的一些必读的基本书。可是，就文学来说，哪些书必读？有的书目提供得对，有的就不一定适用。1923年有些人给青年开了一大篇书目，如胡适的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、梁启超的《国学入门必读书目》等。鲁迅认为，这些书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是他们自己想要看或未必想要看的，“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，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去摸门径去”（《而已集·读书杂谈》）。

其实，鲁迅给许世瑛开的一张书单倒是很适用的，那时许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，这些书目“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，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”：

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（四部丛刊本，又有单行本。）

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（今有木活字单行本）

严可均 全上古……隋文（今有石印本，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，可不看。）

丁福保 全上古……隋诗（排印本）

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（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，

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。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，未必真是“大事”，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《模范最新世界年表》。）

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丛（广雅书局本，亦有石印本。）

四库全书简明目录（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，但须注意其批评是“钦定”的。）

世说新语 刘义庆（晋人清谈之状）

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（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）

抱朴子外篇 葛洪（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）有单行本论衡 王充（内可见汉末之风俗）

今世说 王晔（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）

这张书单与别人开的书目不同，着重目录学、年谱和各个时代的社会状态，引导初学者掌握文学及其有关的比较广泛的基本知识。

其次，书目能使你了解各种著作的概况。例如，《四库书目提要》或《简明目录》，“这可要细看，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”（《且介亭杂文·随便翻翻》）。这是指的古籍。如要研究当代的，可从有些书刊的“报刊文章篇目”专栏获得所需要的目录，同时自己也要经常编目备查。

著名史学家陈垣掌握了广泛的目录学知识，认为研究和教学，要“从目录学入手”，“目录学就好象一个账本，打开账本，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，可以了然。”

再次，书目和著述的关系更是非常密切。在动手研究任何问题之前，必须先查书目和论文索引，把跟这个选题有关的资料都找来翻阅，调查前人某方面的研究成果，要了解这个问题以前有人研究过没有？他的结论是什么？是不是他还有遗留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？不首先了解前人的成果，就有可能白费力气，得出来的结果往往不会超出前人的范围。如果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人研究过，或者没有搞透，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，那就可以进行你自己的研究。

据说，有一个偏僻小城的中学教师齐奥尔科夫斯基，由于得不到资料，无法查阅有关书目和索引，一生的创造大部分重复了前人的发现。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有益的教训。

比 较 异 同

创造性的学术研究，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，而不能在原地踏步。“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”（梁启超语）。怎样才能做到有所前进呢？这就得把自己的研究选题与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。

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之中，都是与另一事物有相同之处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要研究某一对象，就得把同类对象进行比较，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。

鲁迅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（以下简称《史略》），善于比较异同。1925年陈源诬蔑《史略》“剽窃”日本人盐谷温的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（以下简称《讲话》），鲁迅在《不是信》一文中“回敬”了陈源的这种卑鄙“勾当”：“盐谷氏的书，确是我的参考书

之一，我的《小说史略》二十八篇的第二篇，是根据它的，……但不过是大意，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。其他二十六篇，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，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。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，他以为真，我以为假；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，我却用法。六朝小说他据《汉魏丛书》，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，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，稿本有十册在这里；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《唐人说荟》，我是用《太平广记》的，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……。其余分量，取舍，考证的不同，尤难枚举。自然，大致是不能不同的，例如他说汉后有唐，唐后有宋，我也这样说，因都以中国史实为‘蓝本’”。

《史略》与《讲话》的相同点：一是史实。史实本身无法随意改动，是客观存在；这是不能不大致相同的。二是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，作为自己的根据。学术研究成果不但凝结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，闪烁着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的火花，而且也凝结着大量的人类的集体智慧。马克思说，一切科学者，一切发现，一切发明，总是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，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。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研究，主要是利用了美国学者摩尔根的成果。

但《史略》的绝大部分不同于《讲话》，甚至截然相反。例如《唐人说荟》，后者是把它作为可靠的材料来依据的；前者则断定它有许多谬误：或删节、硬派、乱分，或乱改句子、乱题撰人、妄造书名、弄错时代。鲁迅在《破〈唐人说荟〉》一文中指出：“……这一部书，倘若单以消闲，自然不成问题，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，可就误人很不浅。我也被这书